

文津出版

文史哲大系二七二

錢穆

《論語新解》研究——
以比較為主要進路的考察

梁淑芳◎著



錢穆
《論語新解》
研究

——
以比較為主要進路的考察

文史哲大系 272
梁淑芳 著

天津出版社 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錢穆《論語新解》研究：以比較為主要進路的
考察 / 梁淑芳著. -- 初版. -- 臺北市：
文津, 2013. 08
面；公分. -- (文史哲大系；272)
ISBN 978-957-668-998-7(平裝)

1. 論語 2. 研究考訂

121. 227

102015162

文 史 哲 大 系 ②72

錢穆《論語新解》研究

——以比較為主要進路的考察

著 者 者：梁 淑 芳

發 行 者：邱 家 敬

出 版 者：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 10662 建國南路二段 294 巷 1 號

E-mail: twenchin@ms16.hinet.net

http://www.wenchin.com.tw

電話：(02)23636464 傳真：(02)23635439

郵政劃撥：00160840 (文津出版社帳戶)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 5820 號

25 開本 (15×21 公分) 280 頁

初版：2013 年 8 月一刷

新台幣 310 元

ISBN 978-957-668-998-7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關於《論語》這一部儒家經典	1
第二節 錢穆與《論語》	6
第三節 相關研究成果述評	15
第二章 《論語新解》之形式與內涵特色	23
第一節 《論語新解》的著述旨趣與書寫體例	23
第二節 《論語新解》的解釋取向與特色	39
第三章 《論語新解》與古代中日學者《論語》讀本的比較 ——以王夫之與伊藤仁齋、荻生徂萊、安井息軒爲 觀察對象	73
第一節 論述緣起	73
第二節 《論語新解》與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的比較	81
第三節 《論語新解》與伊藤仁齋等三位日本學者的相關 解釋之比較	95
第四章 《論語新解》與早期《論語》讀本之比較 ——以蔣伯潛等四家的相關著作爲觀察對象	141
第一節 《論語新解》與蔣伯潛《論語讀本》之比較	143
第二節 《論語新解》與王天恨《四書白話句解·論語》 之比較	154
第三節 《論語新解》與李曰剛《論語正譯》之比較	163

(2) 錢穆《論語新解》研究——以比較為主要進路的考察

第四節	《論語新解》與梁正廷《論語新詮》之比較	179
第五節	小 結	200
第五章	《論語新解》與晚近的《論語》讀本之比較	
	——以楊伯峻、王熙元的相關著作為觀察對象	203
第一節	以「先進於禮樂」章為例	205
第二節	以「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章為例	220
第三節	以「林放問禮之本」章為例	229
第四節	以「公山弗擾以費畔」章為例	238
第六章	結 論	251
	徵引書目	26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關於《論語》這一部儒家經典

經書在中國群籍之中，一向被立為四部之首，其中，《論語》雖不在五經之列，卻堪稱是儒家最重要的經典，也可以說是中國古書中流傳最廣的一本。

《論語》被漢儒趙岐（約 108-201）尊為「五經之鎔鑄，六藝之喉舌」，¹南宋朱熹（1130-1200）重構經典內容，將《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合為《四書》，《宋史·道學傳》云：「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傳，其學加親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為先，明善誠身為要，凡《詩》、《書》、六藝之文，與夫孔孟之遺言，顛錯於秦火，支離於漢儒，幽沉於魏、晉、六朝者，至是皆煥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²《論語》身為《四書》之首，在儒家經典甚至是整個中國文化中的地位當然可以更加提高，³朱子甚至還說過這樣的話：

¹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收於《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台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第8冊，卷首，〈題辭解〉，頁6。

² [元]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36冊，卷427，頁12710。

³ 李隆獻：「《論語》就像一部孔門言行錄，記載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論行事，在性質上屬於子部，與《墨子》、《莊子》、《荀子》等同屬子

「《語》、《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語》、《孟》用三二年工夫看，亦須兼看《大學》及《書》、《詩》，所謂『興於詩』。諸經諸史，大抵皆不可不讀。」⁴朱子的看重《論語》由此可見一斑。至於朱子之特別重視《四書》，不惜重排經典之次序，主要是立基於功夫論的角度，如同研究者所說的：「儒家學者所詮釋的《四書》學之所以能夠轉化成生活日用的實踐工夫，其根本原因就在於《四書》原本就是聖人修身工夫與實踐歷程的記錄。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等先聖先賢均終生極力於修己治人的實踐活動，他們在這種修身實踐中獲得許多的感悟與體會，聖賢及其弟子們將這些感悟、體認總結、記錄下來，就成為後代儒者們所讀到的儒家經典《四書》。因此，《四書》只是實踐工夫的記錄，而不是一種知識推理的體系。」⁵

《五經》中頗不乏歷史性、文學性的內容，豐富的知識遍見

書；但漢人尊儒，以為六經皆經孔子之手，故視《論語》為六經之附庸。《漢志》著錄《論語》，即附於『六藝略』之後。到了宋代，理學盛行，朱熹合《論》、《孟》、《學》、《庸》為『四書』，認為孔子、曾參、子思、孟子四人的思想一脈相承，一時之間，『四書』成為儒家新寶典，學子學習的入門書，於是『四書』的地位逐漸陵越『五經』之上；《論語》的地位也越加提高，成為世人崇奉不移的『經』書。元仁宗皇慶二年（西元1313），舉行科舉，規定『四書』為必考；且須以朱熹《章句集注》為依據；明清兩代皆沿之；直到清光緒二十七年（西元1904）才完全廢除以『四書』命題的八股文科舉考試，影響之大，可以想見。」見葉國良、李隆獻：《群經概說》（台北：大安出版社，2005年），頁311-320。

⁴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2冊，卷19，頁428。

⁵ 朱漢民、肖永明：《宋代四書學與理學》（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頁319。

其中，《四書》則主要是人生哲學、政治哲學等實踐性特別強烈的討論，從影響的角度來說，《四書》的確是較容易看到效果的，當然，其中以《論語》為最，此所以康有為（1858-1927）言：「宋賢復出求道，推求遺經，而大義微言無所得，僅獲《論語》為孔子言行所在，遂以為孔學之全，乃大發明之，翼以《大學》、《中庸》、《孟子》，號為四子書，拔在六經之上，立於學官，日以試士。蓋千年來，自學子束髮誦讀，至於天下推施奉行，皆奉《論語》為孔教大宗正統，以代六經，而曾子守約之儒學，於是極盛矣。」⁶

關於《論語》之紀錄者與得名之故，根據東漢班固（32-92）的說法，「《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⁷不過，有關《論語》的作者或編輯者究竟為誰，歷來眾說紛紜，屈萬里（1907-1979）曾整理出幾種重要的說法，並做出「其編輯成書，約當戰國初年；或更有後人所附益之資料也」的結論，其說頗為合理。⁸

⁶ 康有為：《論語注》（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序〉，頁2-3。
按：依照康有為的意見，《論語》輯自「守約」之曾門，筆者未必同意此說，此處僅借用其語以概述自宋至民初《論語》備受重視之過程。

⁷ 〔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第6冊，卷30，〈藝文志〉，頁1717。

⁸ 屈萬里：「《漢志》謂《論語》為孔子門人所纂輯，鄭康成更指明編者，以為『《論語》乃仲弓、子夏等所撰定』（《經典釋文·敘錄》引）。康成之言，未詳何據。至〔南朝·梁〕皇侃《論語義疏》則云：『《論語》者，是孔子歿後七十弟子之門人共所撰錄也。』……《論語·衛靈公篇》，記子張問行，孔子告之，而『子張書諸紳』。可見孔門弟子，於所聞孔子之語，必多隨時記錄；甚至書之於紳。《論語》中所收，大都為孔子門人所記錄之語。此類資料最為可貴。然亦有傳聞失

當然，要以一兩句話斷言《論語》的作者或編者問題有其困難，因為此書從初編到結集、流傳、改編、定型，經歷了相當長的時間。此外，《論語》還有今古文之分，西漢時又有《魯論語》20篇、《齊論語》22篇和《古論語》21篇三種抄本流傳，⁹漢元帝時，張禹編成《論語章句》（即《張侯論》），逐漸取代原來的三家。¹⁰後經東漢經學家的多次改編，直到鄭玄以《張侯論》為本，參考《齊論語》、《古論語》為之註解，才有了今日的《論語》基本定式。現行《論語》20篇，字數約一萬六千，¹¹

實之記載，如公山弗擾以費叛而召孔子、及佛肸以中牟叛召孔子之類。此類記載，不但當在孔子既歿之後，且當在孔子弟子皆歿之後。否則，似此誣讒孔子而顯背事實之妄言，當不容其編入書中。然則《論語》者，乃編輯孔子弟子所記孔子之言行、及再傳弟子所記孔子或孔子弟子等之言行者。其編輯成書，約當戰國初年；或更有後人所附益之資料也。詳見氏著：《古籍導讀》（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年），下編，頁104-109。

⁹ 《漢書·藝文志》著錄「《論語》，《古》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傳十九篇」。見《漢書》，第6冊，卷30，《藝文志》，頁1716。戴維：「《論語》編纂於眾人之手，延續的時間也近百年，所以其傳承版系非常複雜，版別也多種多樣，《漢志》記載的有三個……，這表明了漢初至少有這三個版系流傳，同時也表明了先秦時期（主要指戰國）存在這樣三個版系，這三個版系並不是漢初才存在或者說才形成的。……《論語》成書時間長，參與論纂者眾，這樣從理論上來，在其形成過程中必將產生不同的版別，遠遠不止一種。」戴維：《論語研究史》（長沙：嶽麓書社，2011年），頁4。

¹⁰ 屈萬里：「張禹本習《魯論》，又兼講齊說（見《漢書》禹傳及何晏《論語·序》）。《隋書·經籍志》，謂其『晚講《齊論》，後遂合而考之，刪其繁惑，除去《齊論》〈問王〉、〈知道〉兩篇，從《魯論》二十篇為定。』故《漢書·藝文志》列《張論》於《魯論》。然其篇數雖依《魯論》，而章節字句，未必盡同。故時人有『欲為《論》，念張文』之語（見《漢書》本傳）。是古、齊、魯三本外之又一異本也。」見氏著：《古籍導讀》，頁110。

因編輯體例所限，資料十分分散，若非透過後人整理，體系將顯得凌亂。

《論語》之所以會成爲華人世界的寶典，關鍵不在歷代朝廷的強力推廣，主要是其本身原就具有崇高的價值，就內容而言，全書以倫理學爲主，其內容所涉及者多數與所有人切身相關，通過《論語》，我們知道如何立身行事，如何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係等，可以說《論語》的實用性讓讀者深受其益。梁啓超（1873-1929）曾言：「《論語》之最大價值，在教人以人格的修養。修養人格絕非徒恃記誦或考證，最重要的是身體力行，使古人所教變成我所自得，既已如此，則不必貪多務廣，果能切實受持一兩語，便可以終身受用。至某一兩語最合我受用，則全在各人之自行領會，非別人所能參預，別人參預，則已非自得矣。」¹²也就因爲讀者只要從書中摘取數語，極有可能終身受用，故從《論語》中受益者難以計數。

《論語》文字雖然不多，但內容豐富廣博，梁啓超將之區分爲八大類，包括：一、關於個人人格修養之教訓。二、關於社會倫理之教訓。三、政治談。四、哲理談。五、對於門弟子及時人因人施教（注重個性的）的問答。六、對於門弟子及古人、時人

¹¹ 根據清儒魏崧（1785-1854）的統計，「《論語》一萬二千七百字」，魏崧：《壹是紀始》（上海：上海會文堂書局，1925年），第七類，〈文史〉，頁31。錢穆對於《論語》的章數、字數有自己的統計，他說：「孔子思想，幾可說全部盡在《論語》一書中。《論語》共分二十篇，四百九十八章。論其總字數，不出一萬二三千字。」錢穆：〈孔子思想與世界文化新生〉，《孔子與論語》（台北：蘭台出版社，2000年），頁320。不過，根據筆者統計，《論語》全書一共16001字。

¹² 梁啓超：《要籍解題及其讀法》，收於張品興主編：《梁啓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6冊，頁4621。

之批評。七、自述語。八、孔子日常行事及門人誦美孔子之語（映入門弟子眼中之孔子人格）等，¹³而在學術思想史上最具有意義的是，《論語》以仁為一貫之道，孔子把仁緊扣在禮上，以實現仁的政治目標；把仁植根於孝上，以健全仁的倫理體系；用仁統攝義禮忠信，以完成仁的教育，若謂《論語》為一部「仁」書，當屬貼切。

《論語》對中國社會、政治、文化影響至深，而且其影響迄今不絕。在國際上，《論語》外文譯本之多、流傳之廣僅次於西方的《聖經》，論者也往往直接稱譽《論語》為中國人的聖經。

14

第二節 錢穆與《論語》

錢穆（1895-1990）是近代中國著名的儒學學者、史學大師，原名思鏞，字賓四，江蘇無錫人，其本身並未接受過正規的高等

¹³ 梁啟超：《要籍解題及其讀法》，收於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第6冊，頁4620。當然各家所歸類不盡相同，但差異不大，如李師威熊將《論語》內容歸為八大類：對於個人人格修養的見解、對於社會倫理的論述、對於政治哲理的闡述、對於門人弟子及時人的施教問答、對於門人弟子及古人時人的批評，孔子的自述語、孔子日常行事及門人誦美孔子之語、孔門弟子的言論行事。李師威熊：《國學常識與應用文》（新北：國立空中大學，1987年），頁157。

¹⁴ 林語堂：「《論語》一書，一般認為是儒家至高無上的經典，就猶如西洋耶教的《聖經》一樣。……讀《論語》猶如讀 Barlett 之《引用名句集》（Familiar, Quotations），令讀者覺得那些警語名句津津有味，引起無限沉思想像……。」見林語堂著，黃嘉德譯：《孔子的智慧》（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111。

教育，卻能因為著作的價值高超而獲選為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

錢穆早期以治考據學而揚名學術界，¹⁵但其一生乃以闡釋和弘揚中國文化為己任，¹⁶故能走出為考據而考據的治學路線，秉持其作為知識份子的良知與責任，將精神、氣力投注到中國文化的內涵、傳承與前途等議題，也因此而使得他的史學研究最後終於落實到文化學的層面上。

錢穆關懷、探討中國傳統文化，純粹出之以學術的角度，由於他一向認為中國學術史、中國思想史與中國文化史密不可分，正因如此，他的史學也被稱之為「文化史學」。¹⁷如果「文化史學」是一個可以被接受的名詞，那麼，錢穆治學以文化史學為主，這一點應該是毋庸置疑的，¹⁸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錢穆經常

¹⁵ 錢穆早年以考據聞名，凡考一事一物，必旁搜博采，加以證明，自云：「游情於清代乾嘉以來校勘、考據、訓詁學之藩籬，蓋自孫氏此書始。」按：所謂「孫氏此書」係指清儒孫詒讓之《墨子閒詁》。詳見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台北：蘭台出版社，2000年），頁83。

¹⁶ 陳勇謂錢穆：「畢生的學問宗旨和人生的終極關懷就是關心中國文化的傳承，也就是在西方文化的震盪、衝擊下，中國的文化傳統究竟將何去何從？所以他的思想脈絡始終圍繞著現代文明與道德、現代化與傳統之間的關係這一中國現代思想文化上最重要的主題而展開」，見氏著：《錢穆傳》（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1。

¹⁷ 可詳參汪學群：《錢穆學術思想評傳》（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頁266。

¹⁸ 根據汪學群之說，錢穆的史學最後落實到文化上，因此他的史學也稱之為文化史學。他從學術角度來談傳統文化，認為中國學術史、中國思想史與中國文化史是密不可分的。在文化中，他最一般地回答和概括了學術史和思想史的內容，把學術史和思想史提到了一個宏觀的高度。在文化方面，他具體闡述了文化學的理論、中國文化史、中國文化精神、中西文化比較等問題。詳見汪學群：《錢穆學術思想評傳》，頁266。

被列為現代中國的新儒家重要學者，¹⁹其實他個人並不特別好談心性之學，整體學術表現可說是博通經史文學，精研義理與訓詁，考據亦頗擅勝場，而且，錢穆從未曾自認是新儒家，最熟悉其學術思想的人也不會把他歸到新儒家的行列中。²⁰有關中國文

¹⁹ 有關「當代新儒家」(Contemporary Neo-Confucianism)的名單，學者的看法並不一致，較新的說法出自劉述先，劉氏綜合了各家的說法，提出了一個「三代四群」的架構如下：第一代第一群：梁漱溟(1893-1988)、熊十力(1885-1968)、馬一浮(1883-1967)、張君勱(1887-1969)。第一代第二群：馮友蘭(1895-1990)、賀麟(1902-1992)、錢穆(1895-1990)、方東美(1899-1977)。第二代第三群：唐君毅(1909-1978)、牟宗三(1909-1995)、徐復觀(1903-1982)。第三代第四群：余英時(1930-)、劉述先(1934-)、成中英(1935-)、杜維明(1940-)。見劉述先：〈朱子在宋明儒學的地位重探〉，《台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5卷第2期(總第10期)(2008年12月)，頁10。

²⁰ 余英時：「『新儒家』今天至少有三種不同的用法：第一種主要在中國大陸流行，其涵義也最寬廣，幾乎任何二十世紀中國學人，凡是對儒學不存偏見，並認真加以研究者，都可以被看成『新儒家』。這樣的用法似乎已擴大到沒有什麼意義的地步了。第二種比較具體，即以哲學為取捨的標準，祇有在哲學上對儒學有新的闡釋和發展的人，才有資格取得『新儒家』的稱號。在這個標準之下，熊十力、張君勱、馮友蘭、賀麟諸人大概都可以算是『新儒家』。第三種是海外流行的本義，即熊十力學派中人才是真正的『新儒家』。此外有私淑熊氏之學而又為熊門所認可者，如聶雙江之於王陽明，當然也可以居『新儒家』之名而不疑。根據上引第一種用法，我們也許可以稱錢先生為『新儒家』。但這一用法，空洞無意義，決非他所願承受。錢先生的學問宗主在儒家，終極信仰也歸宿於儒家，這是不成問題的。但是他的基本態度是所謂『守先待後』(也就是『述而不作』)；他的主要旨趣是在闡明中國的學術傳統，以待後起者之自為。因此他從未自樹新義，而期人以必從。我們當然可以說，現代人解釋古人的思想，無論自以為怎樣忠實於原著，終不免要把新的觀點帶進來。然而這究竟和有意識、有計畫地建立一個新系統大有不同。……這是史學家的態度，不但和熊十力不同，也和梁漱溟、馮友蘭截然異趣。第二義的『新儒家』則不能用在錢先生的身上，

化的一切，尤其是中國人與中國歷史，就是錢穆的研究中心，在錢穆關注的中國古人古書中，孔子與《論語》無疑最具重要性。根據今人戴景賢的觀察，「當歷史研究成爲一種『敘述』時，錢先生係將創造歷史遠景的真正動力，歸結於各種表現程度不同之所謂『中國人』。亦即：中國歷史乃是由中國人所創造出之一部歷史。此所謂理想意義之『中國人』，其意義的核心價值，以及充實價值之方式，不能僅止說明是儒家的，而應更正確地說明爲乃由孔子義理所導引而充實，並依孔子之理想爲評判之標準。錢先生不僅以中國義理價值之核心爲出於廣義的儒學，而必說明爲出自孔子。」²¹戴景賢的說法相當貼切，錢穆自己也如此自言：「中國宗教亦可說是一種人文教，或稱文化教，並亦可稱之孝的宗教。孝之外貌有禮，其內心則爲仁，由此推擴則爲整個的人心與世道。因此既有孔子，中國便可不需再有西方般的宗教。」²²孔子是錢穆最尊崇的古代聖人，其精神與學說主要表現在《論語》一書中，檢視錢穆之著作，引及、言及、論及孔子與《論

因為他是史學家而不是哲學家。錢先生的研究重點是中國學術思想史，但他儘量避免用『哲學』這一概念。在他看來，中國思想中雖然有與西方哲學相應的部分，而不相應的部分則更佔份量。如果以中國思想之實來牽就西方哲學之名，則恐易流於削足適履。他晚年想通過現代流行的學術分類以比較中西異同，才用了『中國哲學』的名詞。他雖能接受『哲學』的分類，而終覺心有未安。這類的大問題當然不免有見仁見智的不同。但錢先生無意走哲學的道路則是無可置疑的。至於第三義的『新儒家』，那當然更不能包括錢先生在內了。錢先生和熊十力的關係，依照傳統的說法，是所謂『論學之友』。但兩人論學見解頗多不合。」詳見余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鱗》（台北：三民書局，1995年），頁58-61。

²¹ 詳見戴景賢：〈論錢賓四先生「中國文化特質」說之形成與其內涵〉，《台大歷史學報》，第26期（2001年12月），頁43-44。

²² 錢穆：《靈魂與心》（台北：蘭台出版社，2001年），頁30-31。

語》者可謂不計其數，稍加舉例如下：錢穆在〈中國文化與中國青年〉中云：「孔子，中國之大聖，『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是孔子終身常帶一種青年氣度。《論語》，中國之大典，二十篇首〈學而〉，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有子曰：『孝弟為仁之本。』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是孔門師弟子教訓皆主為青年發。《論語》即一部青年寶訓。」在〈中國固有哲學與革命哲學〉中說：「中國固有哲學範圍廣泛，參考書籍不易列舉，竊謂最所扼要，莫如《論語》、《孟子》。若能專治此兩書，雖不旁鶩，亦已足用。」在〈從整個國家教育之革新來談中等教育〉一文中則言：「己之所學在《論語》孔子，己之所教亦為《論語》孔子。所教非我之言，乃《論語》孔子之言。學者非欲其尊信我，乃欲其尊信《論語》孔子。由尊信《論語》孔子，乃亦尊信及於我。」²³錢穆又謂：「中國孔子，除晚年作《春秋》外，本

²³ 以上三篇文章所述分別見於錢穆：《文化與教育》（台北：蘭台出版社，2001年），頁7、124、242。按：上面的文字較具系統，其餘相關資料更是不勝枚舉，如錢穆云：「……《論語》還應該是我們今天人人必讀的一部書。倘使要找一部比《論語》更重要，可以用來瞭解中國文化，又是人人可讀的，我想這不容易。只有《論語》，照我剛才所講條件，從漢朝起，到我們高呼打倒孔家店時為止，本是人人必讀的，在中國沒有一個讀書人不讀《論語》，已是經歷了兩千年。我們要瞭解一些中國文化，我想至少該看看《論語》。」《中國文化叢談》（台北：蘭台出版社，2001年），頁204。「中國自漢到今，一部《論語》可說沒有人不讀，已經有兩千幾百年的歷史了。」《民族與文化》（台北：蘭台出版社，2001年），頁135。「中國有關人生修養的幾部書是人人必讀的。首先是《論語》。切不可以為我從前讀過了，現在毋須再讀。正如天天吃飯一樣，不能說今天吃了，明天便不吃；好書也該時時讀。再次是《孟子》。孔、孟這兩部書最簡單，但也最寶貴。」《歷史與文化

非有意著書。《論語》乃薈萃其門弟子所記，言簡意深，後人闡申不盡。更要者，乃由孔子之學以成孔子之為人。」²⁴錢穆經常勸人閱讀《論語》，故他於〈孔子誕辰勸人讀論語並及論語之讀法〉中特別告訴大家：「《論語》應該是一部中國人人人必讀的書。不僅中國，將來此書，應成爲一部世界人類的人人必讀書。」「若使中國人，只要有讀中學的程度，每人到六十歲，都讀過《論語》四十遍到一百遍，那都成聖人之徒，那時的社會也會徹底變樣子。因此，我認爲：今天的中國讀書人，應負兩大責任。一是自己讀《論語》，一是勸人讀《論語》。」又撰寫〈再勸讀論語並論讀法〉，云：「孔子距今已逾二千五百年，今之爲學，自不能盡同於孔子之時。然即在今日，仍有時習，仍有朋來，仍有人不能知之一境。在學者內心，仍亦有悅、有樂、有愠。即再踰兩千五百年，亦復如是。故知孔子所開示者，乃屬一種通義，不受時限，通於古今，而義無不然。故爲可貴。讀《論語》者不可不知。」²⁵因此，錢穆對於孔子與《論語》的研究是不遺餘力的，甚至可以說，錢穆一生都在關切孔子與《論語》，相關的研究至死方休。

透過錢穆的自述，吾人知道，其與《論語》可謂具有某種奇妙之因緣，例如有一位須沛若先生，乃錢穆在果育與常州府中學

論叢》（台北：蘭台出版社，2001年），頁327。「我們讀《論語》，不是一讀便易懂。或許我們一輩子讀它，還沒有真懂。所以中國人講思想，必兼有行為在內。如我在想孔子，即我在學孔子。學問、思想、行為是連在一起的。我在想孔子之所想，我在學孔子之所學，我要行孔子之所行。」《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台北：蘭台出版社，2001年），頁103-104。

²⁴ 錢穆：《晚學盲言》（台北：蘭台出版社，2001年），上冊，頁547。

²⁵ 以上分別見於錢穆：《孔子與論語》，頁41、42、62。

堂之同學，與錢穆交往甚密。須氏曾經叮嚀錢穆：「先生愛讀《論語》，有一條云：『子之所慎，齋、戰、疾。』今先生患傷風，雖不發燒，亦小疾，可弗慌張，然亦不當大意。宜依《論語》守此小心謹慎一『慎』字，使疾不加深，則數日自愈。」錢穆聽了須氏此語，從此以後閱讀《論語》即知應當逐字逐句從日常生活上求反省與體會。²⁶某日須氏又告訴錢穆：「自知性太拘謹，時讀《莊子》，求自解放。」於是請求錢穆在暑假開班講授《莊子》內七篇，經過這次的講解，對錢穆後來寫成的《莊子纂箋》與《論語新解》有頗大之助益。²⁷基本上，《論語》與《莊

²⁶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頁92-93。

²⁷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頁93。按：錢穆晚年有這樣的一段回憶，通過此段文字，可以讓我們對於錢穆有更深刻的認識：「一日，在其窄室中，沛若問：『《論語》孔子五十知天命，先生今年亦已過五十，敢問知天命之義。』余曰：『此乃大聖之境界，吾儕何敢妄加揣測。余只敢在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上用心。回憶自果育學校、常州府中學堂以來，改朝換代，天翻地覆，社會一切皆已大變。而吾兩人今日在此簷下坐談，豈不髣髴依然是往日情況。此亦可謂是吾兩人之能立能不惑，但只可謂是一種具體而微之能立能不惑，又只是微之又微，微不足道。正如一萬貫錢與一文錢，一文錢太少，太無價值，但亦同是錢。孟子謂人皆可以為堯舜，羅近溪謂端茶童子亦即如聖人，皆此義。儻吾儕能立能不惑，繼續下去，亦可算是吾儕之天命矣。孔子言：『天生德於予。』人之稟賦有高下，德亦有大小。大德敦化，小德川流，縱是溝瀆之水，只川流不息，亦皆朝宗於海。大海是其匯歸歇宿處。此即是天命。』沛若言：『我聞先生言，暫時總得一解放，但不久即依然故我，總不長進。』余言：『余聞兄言，亦立時總得一警策。吾兩人性情有不同，正好相互觀摩，各自得益。勿妄自尊大，亦勿妄自菲薄。惟日孳孳，在安分守己中努力，如是而已。兄謂何如？』沛若數十年來，從不談國家大事，亦不論人物臧否、世局是非，儘只在自己日常生活上自憤自責。其敦厚而拘謹有如此。」可見沛若對於錢穆在體會古籍上的人生大道，確實具有啟發之作用。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頁95。